

元代杭州：一个国际性都会

鲍志成

杭州，是元代中国南方一大都会。它不仅规模宏伟、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而且还是元一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东方的一大国际性都市。本文拟从水陆海交通辐辏、亚欧非各族杂居、多民族文化交融等方面，就元代杭州的国际性作一探讨。

一、水陆海交通辐辏

安全便捷、范围广远的交通，是一个地方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必要条件。在元代，无论是国内各地之间还是与国外的交通，都相当发达。元朝建立以前，蒙古本土以及从和林通往西北诸汗国、中原汉地的驿站，已经建立起来，东西陆路交通，为之畅通。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数达1500多处，所至范围，东北到奴儿干之地（黑龙江入海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部落（叶尼塞河上游地方），西南至于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①是当时国内外交通安全便捷的生动写照。遍布全国乃至通往国外的水陆驿站和驿道，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交通网络，而杭州，则是这一网络中的一大枢纽。

元代的水路交通干线，是大都（今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元初，为了把江南的财赋运到大都，大规模修治运河，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从而使大运河南北贯通，不仅沟通了南北水路航线，而且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②五大水系的航线，连接起来了。据记载，当时从大都到杭州的运河航程，约为两个月。^③沿途设有水站，配备站户、船只，负责供给官差使客食宿并用船只运送。元政府为了养护河道等，还多次下令在运河沿岸、大道旁边等地种植榆、槐、柳等树木。^④许多过往的外国使客、商人、旅行家，通过大运河北上南下。大运河成了南北之间的一条安全便捷的交通干线。

陆路驿道，以大都为中心。杭州位于东南一隅，在陆路交通中，是浙西地区的一个中转站。它的陆路驿道，主要是通往浙西地区的一条干道，从在城站经庙山站（今富阳庙山坞）到新城站（今富阳新登镇），然后西望临川站（前临安境），与其它相邻路、州的驿道相连。通过驿道，杭州还与钦察汗国的塔纳（今苏联罗斯托夫南）有商路相通。^⑤

元代的海上交通，较之前代，更加发达。当时的杭州，是东南航线上的一大港口。印度、埃及等地来杭的舶商，往来不绝，有的还定居于杭城^⑥。而元朝政府遣往南洋乃至东非国家的使臣，也常常从大都循陆路或水路驿站南下，经杭州、泉州等地出航。由于过往使客太多，需索浩繁，致使站户的负担大大加重，无力为继。^⑦为了减轻压力，转运从泉州入口

的大量番货,元政府还一度在杭州与泉州之间,设立过海站十五。^⑧

如此大范围、多渠道的交通网络,在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范围内,它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凭依这种安全便捷的交通,元帝国得以与东方世界其它国家、西方世界进行自由、频繁的交往接触。在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上,西行东来的中外旅行家,为数不少,而其中尤以元代居多。从耶律楚材、丘处机、常德的西游,到卢布鲁克、普兰诺·卡尔平尼、安德烈·海屯的东来;从列班扫马、汪大渊等的西行,到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马黎诺理等的东游;从赵良弼、宁一山等的东访日本,到邵元、雪村永梅等的来华求法,都可证明:元代中外交通之发达,中外往来之频繁。在这些游历家的行程中,杭州往往是必经之地。下面试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马可·波罗一行来华走的是陆路。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拉(今海法北)东行,入伊利汗国境,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港口忽里木子,然后越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由南道继续东行,经斡端(今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又经肃州(今酒泉)、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宁夏(今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内蒙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到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其后,他在中国侨居17年,在大都、扬州等地做官,还奉差到过西南、东南以及东南亚各地。1290年下半年,他由大都出发,陪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国,乘驿南下,经杭州至泉州。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由海道西归,于1293年夏抵达伊利汗国首都桃里寺,完成使命以后,他继续西行,回到故乡威尼斯。^⑨

元中期来华意大利大旅行家鄂多立克,1318年开始东游,从君士坦丁堡到特列比松,再到巴格达,抵波斯湾,在忽里木子乘船赴印度西海岸的塔纳。由此到无离拔、梵答刺亦纳、僧急里、故临,再抵今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乘船长途航行到苏门答腊,遍访南洋诸岛,经瓜哇、加里曼丹、越南而抵中国的广州。由此东行至泉州、福州,北上经仙霞岭,至杭州,复至南京。再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到大都。留居三年后,又游历西南,行经天德、山西,到过西藏的拉萨,然后西折经中亚、波斯回到故乡意大利。^⑩

再如元后期来华的罗马教皇使臣马黎诺理一行,于1338年底奉命从阿维尼翁启程,东向先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前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然后继续沿商路东行到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于1342年7月抵上都,谒见元顺帝。使团一行32人,留居大都约3年,后坚请回国,获准乘驿南下,经杭州至泉州,由海道西还,于1353年返回出发地。^⑪

由上所述几位旅行家的行路程线,可知元代的国内、国外交通,通过水、陆、海交通线的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网络。而统一的国家和驿站制度的建立,又使这种交通既安全又便捷。作为全国经济重镇的杭州,则是这一网络中的一大枢纽。

二、亚欧非各族杂居

国内外交通,尤其是东西方海陆交通的畅通,为中外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元一代,尤其是元初,大批的西域各族人纷纷东来,移居中原各地,而杭州,则是一大聚居点,形成了亚欧非各族杂居的局面。

明杭人田汝成云:“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日

种。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⑫杭州色目人，主要也是回回人。陶宗仪说：“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⑬这说明，当时杭州已形成了回回人聚居街坊。这还可从其它史料得到证实。伊本·白图泰说：杭州的第三城（厢）内，有穆斯林居住区。⑭鄂多立克也说，杭州有四火撒刺逊，每火约十家或十二家组成。⑮他们大多是商人，家饶于资，故称富实回回，且住高楼。当时杭州砂糖局的“糖官皆主鹁回回富商也”，他们用来煎熬砂糖的原料，是处州（今丽水）所产的狄蔗。他们熬制的砂糖，在果木铺高价出售，价格比之官方高出数十倍。⑯主鹁，即术忽的异译，亦即犹太人，在元代被看作回回的一种。这则史料，说明回回商人垄断了杭州的制糖业，从中可见杭州工商界中回回商人的地位和作用。

回回人大多是伊斯兰教信徒，故此，他们居住的地方，必定有清真寺。据伊本·白图泰说，有一个埃及人欧斯曼，是杭州的一大巨商。他曾为其子孙修建了一座道堂，“建筑美丽，慈善基金很多，内有一批苏非修道者。欧斯曼还在该城修建了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⑰此外，据田汝成记载，文锦坊南有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瓦丁所建的清真寺，寺基高五六尺，扃牐森固，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⑱这所礼拜寺，就是现存的伊斯兰教四大名寺之一的凤凰寺。由于杭州有大批回回人居住，故不仅有清真寺，而且还出现了公共墓地，聚景园即是其中之一。⑲

此外，其它西域人定居杭州的也不少。如南宋权臣贾似道的故居——养乐园，元时成了江州路同知西域人的居室。⑳杭城之东有伟兀氏（即畏兀儿）居住，家饶金银珠玉帛帛。㉑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记载，当时杭州还有基督教人、犹太人以及崇拜太阳的土耳其人，并且人数很多。㉒鄂多立克也说杭州有基督教徒。马可·波罗则感叹杭州人口众多，仅有景教（即基督教远东支派—聂斯脱里派）堂一所。㉓据《至顺镇江志》卷九记载，杭州的这座景教堂，是中亚薛迷思干（前苏联撒马耳罕）的马薛里吉思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建立的，位于荐桥门，名为大普兴寺。另外，元代海上交通发达，东非、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舶商来杭的也很多，有的定居杭城。马可·波罗就说杭州有许多印度等地的商人，以及他们贮藏货物的栈房。

综上所述，元代杭州，确已形成了中外各族相互杂居的局面。

三、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中外各族杂居，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这种交流，内容是多方面的。这里从文化景观角度，着重谈谈杭州汉族人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西域各族移民的逐渐汉化两个方面。

杭州是文物之邦，号称“中夏声名文物之区”，故当时来杭的西域人往往受汉文化的影响，取汉名，习汉字。如阿鲁浑人浦道吾（字善初），因宦于杭，迁居钱塘拱卫乡，有六子九孙，均取汉字，“三世衣被乎诗书，服行乎礼义”，是一个汉化了西域家族。其子溥博，字仲渊，娶萧山沙氏为妻，生有四子。这是中外异族之间通婚的一个典型例子。㉔北庭畏兀儿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门，自其祖参政忽撒公树槐三章于居之后苑，稍治园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弹琴读书，或与客觞咏，必于圃之所”㉕由此足见这位色目文人的

风雅情趣和汉化之深了。有的色目人还精通汉文经典,考中了进士。如唐兀人迈里古思,字善卿,父别古思,因官而居于杭。他“自幼有奇气,善击搏技,既而自悔曰:伎勇有敌,圣旨之学无敌也。遂从师,通《诗》、《易》二经,以诗登进士第,官绍兴录事长。”^⑧回回人于阗慕离,家居杭州,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⑨

杭州中外各族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侧面,是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当时杭州人所穿之靴,仿高丽式样,并成为一时所尚的流行款式。^⑩从东南亚进口的胡椒,成了居民日常惯用的调味品,日进耗量达40担之多^⑪西域所产的西瓜等佳果美实,开始成了杭州社会上层人士相互馈赠的上等礼品。^⑫回回人阿里海牙之孙贯云石,隐居钱塘,卖药市中。^⑬“白紵乌纱碧眼深”的西域相者王月屋,携带布囊诗卷,在杭城设摊看相,聊以度日。^⑭

所有这些,都汇织成一幅元代杭州中外各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光怪陆离的人文景观。

四、余 论

从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知道,元代杭州,在对外交通上,通过相互连接的水(海)陆要道,可与亚洲各地、欧洲大陆和非洲东北部相通;在人口的民族成份上,不仅有元朝本土的蒙、汉等族人,而且还有许多外来移民,他们有的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地,也有的来自东欧和北非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不仅汉文化与西北边疆各民族文化相交融,而且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也在这里相汇,形成了世界东西方几大文明的大交汇局面。这,在元以前的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知道,汉、唐长安(今西安),其对外交通,西向陆道虽有丝绸之路堪与元比,但因地处内陆,东阻于海,其东南海道与元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汴京以及辽、金、西夏诸都,其情形更不待言;南宋临安及东南沿海各城,诸如广州、泉州、宁波等地,虽东南皆通于海,而西北均阻于陆,故其交通都不及元代杭州。至于外来侨民,东汉洛阳有身毒(印度)僧,隋、唐长安,有中亚诸胡、波斯、大食(阿拉伯帝国)人及东瀛日本人,唐、宋时期扬、广、泉、杭诸州亦有东南亚、大食及日本人。而元杭州,不唯有来自上述诸地之移民,复有东欧、北非之侨民。此外,中西文化交流虽因时代不同而有异,然其在范围、规模、内容、结果诸方面,也确相差甚远。就外来宗教之传播而言,东汉洛阳有佛教之传入,唐朝长安有景教徒之道途,唐、宋东南各城有伊斯兰教以及摩尼教之流播,而元杭州等地,不仅有伊斯兰教、景教、喇嘛教之传播,复有或罗马天主教、或伊斯兰教苏非派之存在。凡此皆说明,在南宋都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杭州,成了东方文化迎接西方文化的一大窗口,是元以前的中国乃至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也罕见的国际性都市。

从元杭州的国际性,我们可看出:元代社会是相当开放的,这是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而这种开放,无论是对汉、蒙各民族文化的的发展,还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都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①王礼:《义冢记》、《麟原集》前集卷六。

②《元史》卷六十四、六十五《河渠志》,苏天爵:《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记》,《滋溪文稿》卷三。

③[埃及]教育部颁、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56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又据阿拉伯文史书《Masālak al-Absār》,汗八里(KhanbaliK)到杭州,水、陆路行程为40天,见亨利·玉尔校注《马可·波罗行记》(英文版)

第214页注12。

- ④《元典章》卷二十三，《户部》九，《栽种·道路栽植榆柳槐树》，卷五十九，《工部》二，《道傍等处栽树》，[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405页，中华书局，1954年。
- ⑤参见：《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一九四二二，中华书局影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帕哥罗提：《通商指南》，转引自《元朝史》下册391页。
- ⑥参见《马可波罗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杭州的部分。
- ⑦《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至大二年夏四月”条。
- ⑧参阅：《经世大典序录·兵杂录·驿传》，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十一；《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卷十六《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条。
- ⑨参见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收入作者自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 ⑩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
- ⑪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2, London, 1866
- ⑫⑬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
- ⑭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嘲回回》。
- ⑯⑰⑱《伊本·白图泰游记》，556—557页。
- ⑲《鄂多立克东游录》，68页。
- ⑳㉑杨瑛：《山居新语》。
- ㉒《南村辍耕录》卷十一《女奴义烈》。
- ㉓《马可波罗行纪》，中册，574页。
- ㉔宋濂：《西域蒲氏定姓碑文》，《宋文宪公全集》，卷九。
- ㉕杨维禎：《槐圃记》，《东维子文集》卷十七。
- ㉖《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四。
- ㉗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卷上。
- ㉘《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处士门前怯薛》。
- ㉙《马可波罗行纪》，中册，《补述行在》。
- ㉚大沂：《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蒲室集》卷五；吾丘衍：《西瓜诗》，《竹素山房集》卷二。
- ㉛《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一。
- ㉜任士林《赠相考王月屋》，《松乡集》卷九。

书 讯

我院中文系朱广成副教授撰写的《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一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是作者在讲授《文心雕龙研究》选修课的基础上，并结合多年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它对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的全貌，作者刘勰的思想以及全书的理论结构体系等问题作了概要的阐明，并突出了《文心雕龙》的精华部分——文术论；对创作论中的主要问题，如想象与构思、感情与文采、情景与描写、结构与谋篇、语言与修辞、艺术风格论等，从文学和美学角度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所分章节和问题，既较符合刘勰原著精神，又顾及现代创作理论的体系。对原文有流畅的白话翻译，有简明扼要的注释和解说，是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的一本较好的参考书。

（严斯康）